

湖南师范大学
教授 刘重德

“欧化”辨析

——兼评“归化”现象

英译汉中的所谓欧化现象,实指英化现象,常有争论,莫衷一是。笔者也曾多次考虑过这个问题,现略抒己见,以就正于读者和专家。

大家知道,世界上各民族的语言都是不断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迁的,绝非一成不变。根据斯大林的观点来说,语言“是千百年来社会历史全部进程和基础历史全部进程所产生的。语言不是某一个阶级所创造的,而是全社会、社会所有阶级、几百代的努力所创造的。”换句话说,“它是许多时代的产物,在这许多时代中,它形成起来、丰富起来、发展起来、精炼起来。”^①

语言不断发展这一科学论点,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无一例外,汉语如此,俄语如此,英语亦如此。对比一下古汉语和现代汉语,就会立即发现千百年来惊人的变化。现在让我们先对比一下《论语》第一篇《学而》的头两章古汉语原文和它们相应的现代汉语的译文:

原文:

(1)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2) 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人之本与!

译文:

(1) 孔子说:“学习而且时常温习所学的东西,不也是(令人)高兴的吗?有朋友自远方来,不也是(令人)快乐的吗?人家不知道自己,自己不抱怨,不也是君子(的表现)吗?”

(2) 有子说:“为人孝顺父母、尊敬兄长却喜欢冒犯上级,这种人是很少的;不喜欢冒犯上级却喜欢作乱,这种人是没有的。君子追求根本。根本确立了道义就会产生。孝顺父母尊敬兄长,这就是仁的根本吧!”^②

从读音、用词到造句方法,只消一看一读,便会立即感到古今大不相同。例如,“说”读“月”,相当于现代汉语“悦”字;“弟”读“替”,相当于现代汉语“悌”字。就词汇构成说,古汉语单音节较多。就句式说,陈述句、疑问句、否定句等表达方式均不相同,不用剖析,便可看得一清二楚。

俄语从普希金(1799—1837)逝世一百多年来所发生的变化,也同样是很大的。俄语发生了什么变化呢?“在这个时

期中,俄罗斯语言大大地增加了词汇,有很大一批陈旧了的词从词汇中消失了,有很大一批词的意思改变了,语言的文法构造改进了。至于普希金的语言结构和它的文法构造及基本词汇,几乎完全保存下来了,成为现代俄罗斯语言的基础。”^③

英语发展的历史尤为复杂,至少可分古英语、中古英语和现代英语三大阶段。其变体也最多,诸如英国英语、美国英语和加拿大英语,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英语,印—巴英语、非洲英语等,各有特点,各有习惯用法,特别是词汇中外来语之多,堪称各种语言之冠。英语语法结构的变化也很大,总的特点是由综合形式走向分析形式,整个句子结构变得比较简单和合乎逻辑。

理解了各民族语言本身都在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随着时代变迁而变迁这一普遍规律,对于英译汉中出现的一些欧化现象,就会认为是不可避免、理所当然的事情。因为第一,翻译牵涉到两种不同语言的转换;第二,各种语言各有特点,尤其是两种不同语系语言之间的差异就更显著;第三,翻译和创作不一样,译者必须时刻尊重原作的思想内容、原作的语言特点、文化内涵以至原作的文体风格。如果所译的是文学作品,译者更须力争做到信、达、切,即“信于内容,达如其分,切合风格。”^④不少中外著名翻译家均有类似论述。例如严复的信达雅、林语堂的信达美、英国泰特勒的三总则。当然,像朱光潜教授那样,用一个信字来概括文学翻译的要求,也会达到殊途而同归的效果。他说:严又陵以为译事三难:信、达、雅。其实归根到底,“信”字最不容易达到。原文“达”而“雅”,译文不“达”不“雅”,那还是“不”信;如果原文不“达”不“雅”,译文“达”而“雅”,过犹不及,那也还是“不”信。所谓“信”是对原文忠实,恰如其分地把它的意义用中文表达出来。有文学价值的作品必是完整的有机体,情感思想和语文风格必融为一体,声音与意义也必然无间。所以对原文忠实,不仅是浮面的字义忠实,对情感、思想、风格、声音节奏等必同时忠实。”^⑤

上引各家的论点,文字表述尽管不尽相同,但究其精神实质,则不妨暂作如下概括: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必须对原文亦步亦趋,紧扣原文,以原文为本,万变不离其宗。违背这个

①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 p. 3, p. 5, 人民出版社, 1950。

② 译文系笔者参考张以文的译文修订而成,可参看张以文注译《四书全译》, p. 60, 湖南大学出版社, 1989。

③ 《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 p. 6。

④ 刘重德《文学翻译十讲》, p. 26,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95年第二次印刷本。

⑤ 朱光潜《谈翻译》, 罗新璋《翻译论集》, p. 448, 商务印书馆, 1984。

总原则总要求,翻译便不成其为翻译。

在此前提下,来进一步讨论英译汉的欧化问题,则更是名正言顺,顺理成章。之所以称欧化,乃是因为近代中国所译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包括文学)的作品,多译自欧洲英、德、法、俄等主要外语语种,实质上它在这里只是:“外化”或“洋化”的代名词。

既然是翻译,在大不相同的两种语言转换的过程中,遇到彼有此无的人名地名、物质名称、抽象名称怎么办,你能不面对这种现象设法或音译或意译或音意合译把这些名物一一移植过来吗?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现代汉语中就出现了诸如威廉·莎士比亚之类的洋人名,伦敦、巴黎之类洋地名,咖啡、可可之类的洋饮料,鳄鱼眼泪、一石二鸟之类的洋成语。要想避免词语的欧化,你除非不从事翻译,否则,就无处可逃。譬如说,你译的是自然科学,能不接受火箭、激光、镭、钡、软件等等的外来新词语吗?

回顾一下本世纪初我国引进社会科学的过程,就更为有趣了。有些名词都有过先音译后意译的过程,例如 science 先音译为赛恩斯,后意译为科学;democracy 先音译为德谟克拉西,后意译为民主;bourgeois 先音译为布尔乔亚,后意译为资产阶级;proletariat 先音译为普罗勒塔利亚,后意译为无产阶级。经过广大读者的筛选鉴定,音译被淘汰,意译被采用。再拿我们最熟悉的“社会主义”一词来说,也还是直到1902年才在中国《新民丛报》上第一次出现。年轻时候一度在文学书中读到过一个音译词“烟士皮里纯”,至今还记得。目前年轻人可能不知道它指什么,因为它早已被其相应的意译词“灵感”取而代之了。由此可见,语言文字的演变,也颇有点像物种演变的道理:适者生存,劣者淘汰。

关于外译汉中的欧化(洋气)问题,鲁迅有很精辟的论述,他说:“如果还是翻译,那么,首先的目的,就在博览外国的作品,不但移情,也要益智,至少是知道何地何时有这等事,和旅行外国是很相像的:它必须有异国情调,就是所谓洋气。其实世界上也不会有完全归化的译文,倘有,就是貌合神离,从严辨别起来,它算不得翻译。凡是翻译,必须兼顾着两面,一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保存着原作的丰姿。”^①此外,鲁迅还主张译文中可以装进异样的句法。举例说:“远的例子,如日本,他们的文章里,欧化的句法是极平常的了;近的例子,就如来信所说,一九二五年曾给群众造出过“罢工”这一个字眼,这字眼虽然未曾有过,然而大众已都懂得了。”^②

我认为,对英译汉中的欧化问题,我们所应采取的正确态度是:既有必要又要适度。过犹不及,生搬硬套与拒不吸收,都是同样不符合翻译的客观规律的。

我国长期的翻译实践业已证明,译文中欧化(洋化)已经极大地丰富了我们的现代汉语。朱自清说:“新文学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语在加速地变化。这类变化,一般称为欧化,但称为现代化也许更确切些。这类变化虽然还只见于写的语言——白话文,少见于说的语言,但日子久了,说的语言自然会跟上来的。”^③

北大王力教授经过多年研究,在1954年出版的《中国现

代语法》一书中,专门写了《欧化的语法》一章,他说:

“最近二三十年来,中国受西洋文化的影响太深了,于是语法也发生了不少的变化。这种受西洋语法影响而产生的新语法,我们叫它做欧化的语法。……

“咱们对于欧化的语法,用不着赞成,也用不着反对。欧化是大势所趋,不是人力所能阻隔的;但是,西洋语法和中国语法离得太远的地方,也不是中国所能勉强迁就的。欧化到了现在的地步,已完成了十分之九的路程;将来即使有人要使用中国语法完全欧化,也一定做不到的。……

“所谓欧化,大致就是英化,因为中国人懂英语的比懂法、德、意、西等语的人多得多。拿英语来比较研究是更有兴趣的事;……”^④

王力把中国语法中的欧化现象综括成六个子目,例证丰富,但限于篇幅,每个子目只能选举数例:

一、复音词的创造

凡两个或更多的字合成一个词,叫做复音词。中国本来是有复音词的,近代更多,但是不像现代欧化文章里的复音词那样多,打个很粗的比例,古代近代和现代复音词数目大约是一、三和九之比。例如:

咖啡(coffee),坦克车(tank),逻辑(logic),幽默(humour)。

二、主语和系词的增加

(一) 主语的增加

近来书报上的文章,因为欧化的缘故,主语的数量渐渐增加,所以不用的地方也用起来了。例如:

我在康桥虽没马骑,没轿子坐,却也有我常常在夕阳西晒时骑了车迎着天边扁大的日头直追。(徐志摩《我知道的康桥》)

(二) 系词的增加

对描写句增加系词“是”的这一欧化现象,王力持怀疑态度,笔者同意他的分析,它在现代汉语的发展中,仍有待时间的进一步考验,所以例句从略。

(三) 句子的延长

句子的延长,就是多用句子形式和谓语形式构成次品或末品。本来,复音词增加,已经使句子加长了一倍,再多用次品句子形式之类,自然更长了。

《红楼梦》一类的书,也不是绝对没有长句子。例如:

比如袭人、琥珀、素云、紫鹃、彩霞、玉钏、麝月、翠墨跟了史姑娘去的,翠缕、死了的可人和金钏,去了的茜雪,连上你我,这十来个人……

但是,到了现代欧化的文章里,更大量地应用了。例如:

夜里她也曳着白衣蓝裳,头上插着新月的梳子,胸前挂着明星的璎珞,翩翩地飞行于海波之上。(谢冰心《往事》)

本节里所谓句子的延长,并不是说每一个欧化的句子都比非欧化的长,而是多数的欧化句子比非欧化的长。句子长的原因是有的长有长的修饰品,而长的修饰品就是西文的一种特色。有时候,若要运用现代的思想,使文章合于逻辑,确有写长句子的必要;但是,勉强把句子拉长应该认为是一种毛病。

① 鲁迅《“题未定”草》,《翻译论集》,p.301。

② 《鲁迅和瞿秋白关于翻译的通信》,《翻译论集》,p.276。

③ 王力《中国现代语法·朱序》,pp.11-12,中华书局,1954。

④ 王力《中国现代语法·欧化的语法》,pp.299-300,中华书局,1954。

所以句子的欧化应该是不得不然的,而不应该是勉强模仿的。

(四) 可能式,被动式,记号的欧化

这类欧化现象,一般人印象较深。为了节省篇幅,恕不举例。

(五) 联结成分的欧化

欧化的文章对于联结成分,可以有三种办法:

(1) 扩充中国原有的联络成分的用途,如“和”“而且”“或”“因”“虽”“纵”“若”等,都比以前更为常用;(2) 借中国本来的动词去抵当英文的联结词,如以“在”和 in 相当,以“当”和 when 相当;(3) 以中国动词和联结词合成一体去当英文的联结词,如以“对于”和“关于”和 to 或 for 相当等。

(六) 新替代法和新称数法

新替代法如第三人称之分阳、阴、中三性:他(he)、她(she)、它(it)等。

新称数法,受西洋的影响颇大。除了“公尺(metre)”“公升(litre)”“公斤(kilogram)”之类外,最常用的还有“码(yard)”“磅(pound)”“吨(ton)”等。

根据笔者的研究,还有一种已被现代作家接受并运用的欧化句式,王力还未曾提到,那就是某些状语从句的后置,特别是原因状语从句、条件状语从句和让步状语从句的后置。这种新句式不仅在现代翻译文学中,而且在现代文人所写的散文和小说中,均属常见。

这类状语从句,在从前汉语的传统表达法中,多为从句在前,主句在后。但自20世纪初中国新文学运动以来,在翻译的影响之下,这类欧化现象已被许多文人接受,因为它们像别的有用的欧化现象,在不知不觉中丰富了现代汉语,因为它们都是出自语境的需要。例如:

1 过去的几十年里我的生活一直非常宁静。这是我自己选择的一种生活方式,因为我不善于与人交往;因为我希望工作,喜欢安静;也因为我身体不很好,需要休息。”^①

这是文学翻译的例。很明显,它是出自篇章语境的需要。第二句是跟着第一句来的,写到这里,信的作者忽然觉得有补说“原因”(理由)的必要,也只有把三个原因状语从句写到主句的后边了。

2. 再往前走就是春天了,如果进到天山这里还像秋天的话。

3. 鱼化石毕竟还是没有真正生命的东西,它虽然栩栩如生。^②

2、3 两个例句是从《现代汉语修辞学》一书中借来的。²是条件状语从句后置,3是让步状语从句后置,编者说这种倒装是为了强调,但笔者认为主要是出于作者或说者的心理作用,在写(说)了主句后,突然觉得有补说条件或表示让步的必要,以便使语气委婉,免得武断。

2、3两种后置状语从句的这种所谓欧化的表达法,已不陌生,一般知识分子都能脱口说出这类倒装句式。例如:

1. 明天到舍下来一下,如果(假使)您愿意的话。

2. 这篇文章的内涵极其丰富,虽然(即使,尽管)它很短。

从以上论述看,各民族语言无不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时代的变迁而变迁,其中,不言而喻,已经包含着外来语,即所谓欧化的影响。用历史和唯物观点来看,在此民族交往日益频繁的时代,任何民族语言都不免有“洋化”现象。就汉语来说,洋化(主要是欧化)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关键在于度,这个度就是汉语千百年所约定俗成的基本句法结构,适者逐步被接收,违者必被淘汰。前面举的一些词法以至少数句式,都是已被接受并付诸实际运用的例证。如果有人不顾汉语的基本词法或句式生搬硬套,例如根据英文一般每个句子中都有动词的规则而硬把“花红柳绿”这类描写句套改为“花是红的,柳是绿的”,就根本不会为群众所接受。

至于译文中有时出现的所谓翻译腔(translationese)倒是应该避免和克服的语病,有人把这种语病完全归咎于欧化或直译,笔者认为这种指责不够公允恰当。翻译腔的产生,如果一定要牵连上欧化或直译,那么只能说是欧化或直译的失度或过度,因为任何翻译工作者在初次试译过程中,由于缺乏足够的翻译实践经验,都会出现失度或过度,从而产生一些不大自然流畅的译句,即使是一些有名的翻译家也不例外。现举数例为证:

例一:董秋斯译狄更新的《大卫·科波菲尔》(Dickens: David Copperfield)中的一句话:

They went into the parlour my mother had come from. 他们走进我母亲从以出来的客厅。

英文多么简单易晓;译成“从以出来的客厅”这样的中文谁看得懂?

例二:林疑今译海明威《战地春梦》(Hemingway: A Farewell to Arms)中的几句话:

"It is very dangerous. The nurse went into the room and shut the door. I sat outside the hall. Everything was gone inside of me."

其中最末一句林疑今译成:

我心里所有的都丢去了。

译文不知所云。……现在且看汤新楣怎样翻译:

我心里万念俱灰。

这才是一语中的!^③

例一是个带定语从句的复合句。通常,带个把定语从句的主从复合句,把定语从句译成定语置于先行词前是不成问题的,但这个具体从句则属于不可直译的情况,只能根据汉语意合的特点把这句主从句拆成两句译成流水句法:

他们走进客厅,我母亲刚从那里出来。

我们把前置变后置,也同样说明了他们走进那个客厅,也就是我母亲刚从里面出来的那个客厅。据我所知,中外译论家多数主张直译意译结合用,能直译则直译,不能直译则意译。例如目前市场经济时代所经常说的一句时髦英语"Time is money",自然可以译成“时间即金钱”,多么形象!多么简明!难道还有必要绕圈子去套中国类似义的说法把这句英语意译成“一寸光阴一寸金”吗?真要那么做,那只能说多此一举,吃力不讨好。再如"Practice makes perfect"当然

① 选自《飘》(Gone with the wind)的《作者简介》,译自《飘》的作者玛格丽特·密切尔(Margaret Mitchell)写给佛罗里达一位教授的信,见1992年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世界文学名著系列《飘》(上)。

② 2、3两例借自宋振华等主编《现代汉语修辞学》p.184,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

③ 参看尚维《香港译坛名宿经验谈》,《中国翻译》1987年第5期。

以意译成“熟能生巧”为好。

例二是简单句,句法结构上的理解无问题。看来,问题出在 everything 这个词在上下文中的真正涵义没有吃透,同时,还有个措词是否恰当的问题。汤新楣把 Everything was gone inside of me 译成“我心里万念俱灰”正好表达出男主角当时的心境。

比较起来,翻译腔这种语病仍然多半出在词组连词组、从句套从句的长句的翻译,由于英语的主要特点是形合,它有各种起连接作用的词语可灵活运用,句子再长也层次分明,主从关系一目了然,而汉语的主要特点为意合,没有那么多起连接作用的词语,在不能直译的情况下,硬要直译,势必造成诘屈聱牙以至不知所云的翻译腔。解决的办法只能是根据意合的特点,重新把从句和词组予以调整,用合乎汉语习惯的流水句式把原句中的真正涵义表达出来。

与此同时,对于鲁迅指责过的译文中出现的归化现象,我们则应该坚决反对,群起而攻之,因为它违背了翻译的性质和准则,又阻碍了民族间的文化交流。

鲁迅对归化所下的定义是:“改作,将事改为中国事,人也化为中国人,”以至削鼻子剜眼睛,使翻译面目全非。吴汝纶对严复译的《天演论》在他答复严的信中有类似的批评:“执事若自为一书,则可纵横驰骋。若以译赫书为名,则篇中所引古书古事,皆宜以元书所称西方者为当,似不必改用中国人语,以中事中人因非赫氏所及知。”^①

中国古书汉译英中也有类似的归化现象。曹悫说辜译《论语》《中庸》存在着严重的不足为训的归化现象,表现在:(1)“只要可能一概不用中国人名地名。”(2)“用《圣经》里使徒和人物来比拟《论语》里涉及的人和事。”例如把颜回注释为“孔子的福音使徒约翰”等。(3)把“天命”译作上帝的律令(the laws of God),把圣人译作“献身宗教之人”诸如此类。^②王国维对辜译《中庸》进行了研究与分析,指出:“若视为翻译之书,而以辜氏之言即子思之言,则未敢信以为善本也。其他种之弊则在以西洋之哲学解释《中庸》。最后他下结论说:“辜氏自谓涵泳此书者且二十年,而其涵泳之结果如此,此余所不能解也。”说辜译的毛病主要有两点:一是“过于求古人之说之统一”,一是“全以西洋之形而上学释此书”,前病失之于减古书之意义,而后者失之于增古书之意义。吾人之译,如其量而止则可矣,或失之减或失之增,虽为病不同,同一不忠于古人而已。^③

外国人翻译中国的文学作品,也有移花接木使中国文化归化于译入语文化的做法,例如大卫·霍克斯(David Hawkes)对曹雪芹《红楼梦》中“红、绛、朱、赤”几个同义颜色词的处理,可窥全豹,柯文礼把霍克斯的译法归纳为四种,其中最值得商榷的是第四种——以完全不同的词来代替“红”或者干脆略而不译,如“红楼梦”译为 A Dream of Golden Days,“悼红轩”译为 Nostalgia Studio,“怡红院”译为 the House of Green Delights 或 Green Delights,“怡红公子”译为 Green boy 等等。(杨宪益戴乃迭夫妇则均照字面直译,忠实

地保留了原语文化。)总之,霍是以译语文化代替了原语文化,从而大大损害了这部伟大小说的艺术价值,正如一些红学家指出的那样,“红”是这部小说的主色,也是它主题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还是怡红院的基本色。可以说,“红”不仅与主人公宝玉密切相关,而且与整个小说的主题密切相关,可能与作者曹雪芹本人也密切相关。《红楼梦》中具有如此重要象征价值或意义的“红”字怎能轻易用别的词来代替或略而不译呢?万一担心英语读者不能完全理解,译者也只能加注说明。以译语文化来取代原语文化之类的归化现象应该是翻译的大忌,因为它一方面违背了翻译的性质和准则,另一方面也阻碍了民族间的文化交流。^④

翻译促进语言的发展和丰富,王力研究的结果已经充分证明,西方很多国家语言发展史也同样证明了这个道理。翻译促进民族文化的交流与发展,功在史册,永垂不朽。刘山说:

“翻译是不同国家和民族进行经济、政治和文化交往的产物,又反过来推动他们之间关系的发展,使一国(民族)的文化为别国(民族)所共享,所借鉴,从而促进各国民族文化的繁荣与发展。历史上中国佛教的兴起,佛经翻译为之开辟蹊径,盛唐文化从中受到了潜移默化的影响。欧洲的文艺复兴,也由翻译古希腊罗马的经典著作和重译《圣经》启其端。近代科学技术和人文学科的兴起实以此为契机。近百年来中国的志士仁人为了救国救民,向国外去窃取火种来照亮人民解放的道路。正是我国翻译界先驱以其远见卓识和锲而不舍的翻译实践,给我们民族带来了马列主义,带来了科学技术,也带来了各民族文化的精华。

“就我国近现代历史而言,无论在哲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还是艺术等各个领域中,通过翻译引进的新概念、新思想和新的表现形式是不可胜数的。”^⑤

关于从翻译中提炼新语汇和吸取外国作品中的新语汇和表现方法,茅盾1954年在全国文学翻译工作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中讲得比较公允全面。他说:

“有人以为我国的语汇贫乏,翻译时不够应用,造成了很大困难。但事实却不尽然。语言是从生活中产生出来的,生活在变化在发展,新的语汇也在陆续出现。翻译者和作家一样,也应当从生活中去发掘适合的语汇,或者提炼出新的语汇。这也是翻译艺术的创造性的一个方面。当然,这并不等于说,我们就不应当从外国作品中去吸收新的语汇和表现方法。但要从外国作品中去吸收新的语汇和表现方法,必须是在本国语言的基本语汇和基本语法的基础上去吸收而加以融化。生吞活剥,生搬硬套,都是有害的。”^⑥

结束语

本文首先从语言学理论讲了各民族语言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迁的情况,继而讲了翻译中出现欧化(即洋化)现象之理所当然,并对欧化表达法词语到句式作了初步概括。对翻译中引进的欧化词语以至句式,回

^① 参看陈子展《近代翻译文学》,《翻译论集》p. 200。

^② 参看曹悫《〈论语〉英译本初探》,《翻译通讯》,1985年第8期。

^③ 参看王国维《书辜氏汤生英译〈中庸〉后》,《翻译论集》p. 196—197。

^④ 参看柯文礼英文论文 Translation and Culture—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Translation of Hong Lou Meng,《外国语》,1993年第5期。

^⑤ 刘山《翻译与文化》,《翻译通讯》1993年第5期。

顾一下它的历史功绩,并展望一下它的前景是有必要的。近百年来,语言中的欧化现象大大地丰富了现代汉语的词汇,改进了某些句法,从而大大地推进了中国社会科学(包括文学)和自然科学的发展。就句法说,截至目前为止,应该是已经基本上完成了它的演进(包括欧化)的使命,因为正如斯大林所说:

“语言的文法构造比语言的基本词汇变化得更慢。它当然逐渐发生变化,它逐渐改进着,改良和改正自己的规则,用新的规则充实起来,但是文法构造的基础在很长的时期中都保留着,因为历史证明了,这些基础能够在许多时代中都替社会服务得很好。

“由此可见,语言的文法构造和基本语汇是语言的基础,是语言特点的本质。”^②

至于新词的引进则在长远的未来(包括即将到来的21世纪)都可以说是无止境的,因为它们是由于社会制度改变,由于生产、文化、科学等等的发展的结果所产生的。”^③特别是在此信息时代,发明创造日新月异,人类交往日益频繁,新词语的产生如雨后春笋。例如 Taxi 音译词“的士”,早已是妇孺皆知,并引申出“打的”之类新词语。可见,欧化词语生命力之强。再如有关电脑的新词汇,真是与日俱增,例如电脑犯罪(cybercrime)、电脑警察(cybercop)等等,只要进行有关电脑资料的翻译或交流,你能不接受吗?但新词汇的引进,不能破坏中国现代汉语基本句法和词法这个度。适则接受,违者淘汰。例如在旧中国上海曾一度流行过的半中半西洋径浜英语,早已随着外国租界的消失而绝迹,就是这种道理。香港过去在英人长期强占的历史背景下港人中产生了中英混杂的地方语言。”在香港,时下听一般人说话,三五句当中便来上一两个外来词:如见面时打招呼时的 Hi(嗨,相当于喂),分

别时的 Bye(再见),道谢时的 Thanks(多谢),表示同意时的 OK(好),表示明白的 I see(明白了)。”^④香港已于1997年7月1日回归祖国,全岛欢腾,普天同庆,一国两制,港人治港。从前在英人统治下,出生在香港的华人,对祖国观念日益加深,爱国意识日益加强。尽管基本法仍规定汉语和英语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可以同时使用的法定语言,但港人口头上流行的那种不中不西的混合语,既不是纯正的英语,又不是纯正的汉语,必将随着香港同胞日益提高的民族觉醒而日益减少,以至最后完全消失。因为一个觉醒了民族和地区为保卫自己祖国语言的健康纯洁发展而共同努力,这是全世界所有独立自主的民族所共同奉行的历史规律,在香港回归前就已经兴起的学习普通话的热潮,便是明证。

最后,笔者还想说明一点,那就是文化交流是平等的,其影响也是互相的,取人之长,补己之短,乃文化交流之正轨。我们的文化、语言、文学、哲学等等,在交流中,对其他各国民族也曾经产生并将继续产生影响。譬如说,中国的丝、茶文化,历史最为悠久,享誉全球,英语 silk 和 tea 这两个词,都是从汉语演化而来。再从文学来说,唐诗,通过庞德(Ezra Pound)对李白等人诗作的翻译介绍,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美国意象主义诗派的发展。

① 茅盾《为发展文学翻译事业和提高翻译质量而奋斗》,《翻译论集》,pp.513-514。

② 《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pp.23-24。

③ 《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p.23。

④ 庄泽义《再谈港语的洋化》,《语文建设通讯》(香港),1997年第51期。

(通讯地址:410081 长沙 湖南师范大学外语学院)

(上接第25页) 交流,反映中国文化特色的中国英语,将同它的文化本身一样得到认同;中国英语将像西化句式潜移默化进入汉语,西洋语言的形合特征受到国人的认同一样,渐渐被世人肯定。

参考文献

Lee Pederson. 1993. Language, Culture, and the American Heritage. *Linguistics For Teachers*, MCGRAW-Hill INC, 1993, p6.
李文中, 1993, 中国英语与中国式英语.《外语教学与研究》,第4期18-24页。
刘英凯, 1994, 英语形合传统观照下的汉语意合传统,《英汉语比较研究》第168页.长沙:湖南科技出版社。

钱冠连, 1996, 语用学:人文网络言语学.《读书》,第11期70页。
石定栩, 1995, 洋泾浜语及克里奥语研究的历史和现状.《国外语言学》第4期1页。
汪榕培, 1991, 中国英语是客观存在.《解放军外语学院学报》第1期1页。
周依萍, 李玉舒, 1994, 文化发展的新趋向——科学人文文化.《英汉语比较研究》,第236,240,243页.长沙:湖南科技出版社。
周质平, 1997, 走出语言的“孤岛”.《读书》第9期39页。
鲁守正译, 1987,《英语的特点》第200页.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通讯地址:410083 长沙 中南工业大学外语一系)

Abstracts of Major Papers in this Issue

On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Syntax, Semantics and Pragmatics, by Zhao Xiaohuan, p. 4

The aim of this paper i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syntax, semantics and pragmatics. For this purpose, the author first presents Morris's classical distinction between them, pointing out that the way in which Morris's distinction is worded has a consequence that all linguistic problems can be dealt with either syntactically, or semantically, or pragmatically. Based on his observation of linguistic facts, the author finally argues that syntax, semantics and pragmatics are in fact interdependent and interrelative, and that it is of no use and of no help to draw a hard line between the three disciplines.

Lexical Cohesion in English Texts and Its Translation, by Wu Yicheng, p. 14

In textual translation, the translator should strive to represent the texture of the source text in the target text for achieving textual equivalence. One important aspect of texture is lexical cohesion which means the use of a group of words linking one another in a piece of text. This article discusses by means of exemplification how to preserve various devices of lexical cohesion in the course of translation. It concludes that the translator ought to pay special attention to the form of text (e.g. lexical cohesion) as well as its semantic content; otherwise faithfulness wouldn't be achieved.

"Language + Communication" Approach: A New Methodology in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by Hu Gengshen and Shen Yunzhen, p. 26

This paper presents a new methodology in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which is known as "Language + Communication Approach". The fundamental feature of the approach is based on the concept that the training of Foreign language skills is integrated with the training of Foreign communication skills organically and scientifically. The aspects of the teaching philosophy, teaching materials, teaching methods, ways of testing, and teachers training, etc., which are involved in the performance of the approach, have been discussed. The paper is concluded with a preliminary feasibility study and the general principles on the application of the "Language + Communication Approach" to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t the tertiary level. It also points out the implication to give impetus to the essential reform of the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in China in the years to follow.

An Analysis of "Europeanization and Some comments on the Phenomenon of Naturalization", by Liu Zhongde, p. 47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question of Europeanization in English-Chinese translation. The author holds that the proper Europeanization in the translation from English into Chinese is inevitable according to the Marxist linguistic theory and that one should not confuse it with translationese. As early as 1954, Prof Wang Li made a summary of Europeanization in his *Modern Grammar in China*. Now the writer of this paper adds some instances Prof. Wang didn't mention. And then he makes some comments on the phenomenon of naturalization in translation. Lu Xun firmly opposed it long ago. The present writer says something more in support of Lu Xun's point of view.

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入编刊物

外语与外语教学

(月刊)
1998年第5期
(总第107期)

1998年5月20日出版

主办单位	大连外国语学院
编辑单位	大连外国语学院学报编辑部
主编	张后尘
副主编	顾爱彬 陈建中
激光照排	大连豪文排版中心
印刷单位	大连日报社印刷厂
发行范围	国内外公开发行
国内总发行	大连市报刊发行局
国外总发行	中国出版对外贸易总公司(北京782信箱)

刊号 ISSN 1004-6038
CN 21-1060/H

邮发代号 8-22

国外代号 NT-1106

国内定价 4.80元